

天府镜像与文学中国

当代四川多民族文学发展研究

余红艳◎著

出品单位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
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

主编 ◎ 徐新建

文学人类学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天府镜像与文学中国：

当代四川多民族文学发展研究

余红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品单位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
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

主 编◎徐新建

文学人类学文库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府镜像与文学中国：当代四川多民族文学发展研究/
余红艳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9

ISBN 978 - 7 - 5203 - 4733 - 4

I. ①天… II. ①余… III. ①民族文学—文学研究—
四川 IV. ①I207.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947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潘

责任校对 周 吴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293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四川省社科院眉山分院2019年出版项目资助。

“多民族文学”的范畴意义与多种可能*

徐新建

余红艳博士的专著即将出版，其以四川行省为聚焦，阐述多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区域意义。作者立足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空间与表述的对应关联，呈现了“文学中国”的微观案例及其所映照的“多元一体”。

“多民族文学”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学界日益重要的新概念和新范畴。与以往先后出现过的“兄弟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各民族文学”等相比，“多民族文学”的突出特征在于将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文学拓展为新的多元整体。在这整体中，以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结构，以民族为边界的文学单位不但彼此平等，而且互为主体，交相辉映。

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来说，“多民族文学”具有指向学理与实践的双重功用，一如笔者阐发过的那样，其不仅有助于“建构一种新型的族群构架”，而且还可以用来“谱写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①作为新创建的学术概念和范畴，“多民族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如果说过去的“兄弟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概念分别确立了汉族以外其他民族之文学地位的话，“多民族文学”的命名则标志对多民族国家整体文学

* 本文曾以专栏“主持语”形式与余红艳博士的同组文章一并刊发，经修订增补后改为序。

① 徐新建：《表述与被表述：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和目标》，《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50—55页。

的催生。正如潘年英强调的那样，文学研究领域中从“各民族”到“多民族”的跨越，意味着建构和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承认那些边缘的、不入流的文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文学”^①。

此外，作为能跨越国别、关联世界的学术范畴，“多民族文学”的重要价值还堪比现代全球体系中，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前提、国别文学为单位日趋呈现为整体的“多国文学”。以这样的范畴变革为前提，过去以“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为中心、“非西方文学”为边缘（或陪衬）等级划分且分离表述的格局，将让位于多元对等并关联互补的“世界文学”，即自歌德、马克思等以来便被许多诗人、作家和思想家所向往的文学整体——The word literature。^② 在这意义上，“多民族文学”范畴还具有不同语境中的多重含义：在多民族国家层面，它意指一国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学；而在世界各国组成的全球构架中，则指向既包含所有国家同时又超越国界的文学共同体，也就是英文书写的 Multinational literature（多元民族文学）或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倡导的 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人类整体文学）。^③

在近代中国的话语变迁意义上，“多民族文学”范畴的创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坎坷不易，曲折艰辛。其中的关键所在，是少数民族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历史性登场。晚清至民国，先有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激进主张，^④ 接着是南方梁聚五、杨汉先等提出“五族共和”之外苗夷民族的地位诉求，^⑤ 再后来便出现了与新中国“共同纲领”相呼应的“民族识别”及各民族在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平等互助。正是在这样的多元一体语境下，

^① 潘年英：《从“各民族”到“多民族”：一种新文学史观的表述与建构》，《文学人类学研究》（总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205页。

^② 参见乐黛云《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69—74页；徐新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贵州省文化厅编《面对世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时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 参见叶舒宪《“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4期，第1—9页。

^④ 参见孙中山《中国同盟会盟书及联系暗号》（190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6—277页。

^⑤ 参见梁聚五《苗夷民族发展史》，1951年刊印，收入《梁聚五文集》上册，李廷贵、张兆和编，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10—12页。参见张兆和《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9月。

以少数民族和汉民族长期并置兼容为基础，多民族文学的命名和实践，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日益正式地展现于中国文学与文论的话语之中，成为面对历史与当代的“文学中国”时难以忽视和逾越的新工具。^①

如今，继2004年在成都举办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十余年后，^②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正朝向历史和地域的纵横向度推进。^③历史维度的拓展表现为从当代向古代回溯、延伸并力求用“多民族文学史观”将古今打通。^④地域维度则分别从国内与国际两个方向展开。对国内，学界对“多民族文学”的关注逐渐转向不同区域的具体呈现，考察由多民族实践构成的“文学中国”如何在特定区域中体现一体多元。^⑤面向国际的空间扩展体现为多民族文学的跨文化比较，其中最突出标志是“世界少数民族文学”（World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与对话的践行。^⑥

在结合历史变迁的论述上，郭明军博士论述过“多民族文学”范畴在时间向度的延伸。其将目光转向20世纪前半叶，聚焦民国个案，从卢前对“边疆文学”的论述入手，阐释现代文学史上“多民族文学”观念的早期勃兴。通过郭明军的爬梳辨析，我们看到在那被视为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岁月里，卢前这样的有识之士就已树立了多民族文学眼光与胸怀，开始“把藏族文学、蒙古文学、苗族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并论及了“维吾尔文学在中国文学上的贡献”。^⑦

这样的开拓贡献值得如今的文学和文论史家关注。

与此对应，余红艳博士的专著《天府镜像与文学中国：当代四川多民族

^① 参见徐新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总第23期，第1—19页。

^② 参见《2004年首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掠影》，《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参见明江《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继往开来的十年之路》，《文艺报》2013年11月13日。

^④ 参见关纪新《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58—62页；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12—18页。

^⑤ 参见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⑥ 参见首届世界少数民族文学论坛《平等、正义、爱——世界少数民族文学宣言》，《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年总第37期，第212—215页。

^⑦ 郭明军：《民国时期的“多民族文学观”——以卢前〈边疆文学鸟瞰〉为例》，《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5—9页。

文学发展研究》，重点在于空间之维，也就是把关注聚焦放在了多民族文学的区域呈现。如上所述，作为由广袤且不同疆域构成的多民族大国，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体现，无疑需要从具体多元的视角入手，对特定区域的各自特征予以足够重视方可窥见整体格局的真实全貌。仅以四川大学多民族文学研究团队的成果为例，在此之前便有陆晓芹、梁昭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民间歌唱传统、龙仙艳对湘黔边地苗族古歌的考察阐述、阿库乌雾（罗庆春）对彝族作家“双语写作”的专题阐发及叶荫茵通过苗族银饰和刺绣文案挖掘的符号象征与身体叙事和陈晓军对“少数民族文学在贵州”的剖析等。^①

余红艳的专著以四川行政区域为单位，阐释汉族与少数民族诗人、作家既独行特立又相互依存的文学关联，并力图由此出发，联系国家叙事的整体图像，揭示“文学中国”的多元构成和空间意义。作者欲阐发的观点是：“整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应涵盖不同层面的区域表述”，强调应重视对“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场域构造与状貌”的观察，由此“呈现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现状。”^②

随着学界共识的日益达成，“多民族文学”正取得与“少数民族文学”等既有范畴相比肩的地位。与此同时，由于使用者对范畴理解的不明晰，也存在不少界限模糊的混用。有的学者忽略了中国多民族的多元特征，将其简化为二元对立的1+55，即“汉民族”+“少数民族”。^③有鉴于此，急需正本清源，消除歧义，廓清“多民族文学”的范畴内涵与意指，从逻辑与现实

^① 参见陆晓芹《“吟诗”与“暖”——广西德靖一带壮族聚会对歌习俗的民族志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梁昭《表述刘三姐：壮族歌仙传说的变迁与建构》，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罗庆春《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叶荫茵《社会身份的视觉性表征——苗族刺绣的身份认同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陈晓军《“少数民族文学”在贵州：20世纪的回顾与思考》，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9年。

^② 见本书。

^③ 李晓峰的论文梳理了概念混用现象，指出由于未能对不同概念的科学性及使用的规范性进行讨论和统一，学界存在“少数民族文学”“国内各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甚至“多民族的文学”等在不同语境的同时使用，以至于出现“表述相同但内涵多有差异的‘概念混杂’情形。”但该论述未能阐明“少数民族文学”为何会与“多民族文学”混用的原因，甚至还把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结构简化为主体的汉民族文学及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二元对立显然是有问题的，明显背离了由不同民族构成之多元一体性。参见李晓峰《“少数民族文学”构造史》，《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第8—11页。

的对应出发，通过在时间、空间及价值，也就是历史、地域与思想的三维中加以验证。

在逻辑与知识论意义上，范畴体现的是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分类。^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范畴选择，不同选择折射不同立场和价值取向，继而产生各自有别的话语体系。在近代汉语的表述演变中，与人群分类及判别相关，就出现过同情并承认边缘群体的“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及至后来的“少数民族”“兄弟民族”等与凸显自我中心、强调去民族化的“宗族”“边胞”乃至“一个民族”等立场迥异的对立选择。^②

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研究，在人类的知识演进过程中常有划时代的革命出现。革命的发生源自“范式”（Paradigm）转移。构成范式的要素即包括了特定时代惯常使用的概念、术语和范畴。^③这就意味着当某一论域出现根本性概念及范畴的新旧交替时，变革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价值观念革新和话语体系置换。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实践领域，以“民族”（“国家”）为词根的概念和范畴就不断经历着与时代关联的范式转移。例如，英语中可被汉译为“民族”或“国家”的 nation 一词，当用作政治与文化修饰语时，便由 national 为基点，延展出从 international 到 multinational 的转变。National 意指“民族的”或“国家的”“国民的”“国族的”。加上介词 inter（在…之间）后，可译作“民族间”或“国际的”“族际的”，表示相关与跨越；换以 multi-（多…的）关联，则变为“多元民族（的）”也就是汉语的“多民族”，只不过汉语可用名词修饰名词，故可将后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②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瞿秋白等都使用过“弱小民族”概念并投以明显同情的关注。参见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 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 年第 10 期；瞿秋白《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向导》第 90 期，1924 年 11 月 7 日；另见《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92—493 页。相比之下，与之对立的突出例子可举民国时期的傅斯年与顾颉刚，后者明确反对中国多民族的提法，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 期，1939 年 2 月 9 日。其后有蒋介石署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同样主张对多民族的中国“去民族化”，提出用“宗族”“边胞”取代“民族”。参见蒋介石（署名）、陶希圣（执笔）《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 1943 年版。

^③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年版。

缀“的”省去，派生出与此相关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化”与“多民族文学”等。可见从 nation（民族、国家、国族）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范畴开始，被其修饰、命名与规定的文学、文化乃至国家，便不断由本族（国）为“中心”，转向注重跨界关联的“之间”直至强调交流互补之“多元”的话语演变。若以现代文学的拓展趋势为例，呈现的图景正好是，即：

族别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

其中的“族别文学”可与“国别文学”并置，兼容着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文学；“比较文学”象征跨族际、跨国界的关联对照；作为最终理想目标的“世界文学”就是跨国界的多民族文学，指向的是多元民族的整体文学。

1871 年，法国诗人鲍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创作的《国际歌》被誉为歌曲版的《共产党宣言》。其不但唱响了劳工革命的欧洲战歌，也通过“英特拉雄耐尔”的概念（口号）标志全世界无产者迈入跨国联合的时代。“英特拉雄耐尔”即 international 的音译，用其与 Communism 相加，则组合成“国际共产主义”。汉语转译后的歌辞不仅突显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主人”信念，而且期盼“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拉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①

2016 年 10 月，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同民族作家、学者汇集成都，参与四川大学与西南民族大学共同发起的“首届世界少数民族文学论坛”。会议发表了以“平等、正义、爱”为主旨的《世界少数民族文学宣言》，呼吁：

让我们用人类心灵的力量和文化多样性的魅力，守护脚下每一寸神

^① 据考证，有多人先后参与了《国际歌》的汉译。对于原诗的 international 一词，瞿秋白版本采用直译方式保留音节化的“英特纳雄耐尔”，萧三本则意译为“共产主义世界”。参见宋士锋《传播和实践〈国际歌〉：瞿秋白的未竟事业》，《瞿秋白研究文丛》（第 9 辑），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3—316 页；金点强《中文〈国际歌〉修改好几遍》，《传承》2010 年第 10 期；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XDS201010017&dbcode=CJFX&dbname=CJFXLAST&v=>

圣的山河！用锐气、智勇与信心，开辟世界少数民族裔文学未来发展的光明之路！用友谊和歌与诗，追寻人类生命的恒久价值和意义！^①

笔者有幸参与了此次论坛筹办和《宣言》撰写。如今看来，“平等、正义、爱”的主旨既是“多民族文学”的成果体现，亦揭示了此范畴的价值根基。

回到余红艳这本以四川一省为聚焦的专著，若将其与上述背景相勾连和对照，即不难看出作者对“多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实践性延伸。如前所述，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通过结合四川案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此范畴在国家话语的结构中，如何经由行政化的空间格局得以呈现，从而在学术批评及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扩展了“多民族文学”作为特定范畴的运用可能。我想，作为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余红艳不但以本书证明了自己的学业成果，同时由一己个案回答了“何为文学人类学”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博士论文的完成式书写，呈现文学人类学“做什么”和“怎样做”，从而跳出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词语困扰及其派生的自我纠结。

是以序。



^① 首届世界少数民族裔文学论坛：《平等、正义、爱——世界少数民族裔文学宣言》，《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年总第37期，第212—215页。

目 录

绪论	1
一 本书研究：多民族	1
二 本书为区域实证研究	4
三 研究对象、方法与意义	7
四 本书框架	8
 第一章 四川多民族文学的前世今生	9
第一节 古代四川境内多民族文学	10
第二节 当代四川多民族作家文学	19
一 汉族作家的代际	19
二 少数民族作家产生发展	22
第三节 当下多民族文学区域发展态势	31
 第二章 汉族作家文学的成都模式	34
第一节 从《星星》创刊说起	35
一 文联作协成立	35
二 新时期民间团体喷发	40
三 90 年代后平静写作	45

第二节 大众消费传播	47
一 鲁奖风波与文学事件	47
二 IP 神话与市场营销	48
三 官方作为与民间立场	49
四 远离喧嚣	52
第三节 汉语自觉：成都汉族作家的文学追求	53
一 流沙河：回归传统古典	55
二 “废话教主”杨黎	58
三 何大草的神秘精巧	64
四 颜歌的俗人俗语	73
第三章 裕族作家文学的凉山模式	78
第一节 以汉语新诗发轫	79
一 “一步跨千年”	79
二 《凉山文学》	83
三 “凉山诗人群”	87
第二节 裕诗运动	91
一 官方传播	92
二 学院传播	95
三 民间传播	99
第三节 凉山诗人的抒情诗写	104
一 吉狄马加和倮伍拉且	105
二 巴莫曲布嫫和阿库乌雾	118
三 吉木狼格：非思与去民族	130

第四章 藏族作家文学的甘孜模式	141
第一节 创造品牌：由“康人”到“康巴作家群”	142
一 《贡嘎山》与《甘孜日报》	143
二 “康人”小说	147
三 “康巴作家群”	150
第二节 运作推广：由省到国	152
一 运作主体	153
二 运作模式	154
三 由“省”而“国”	158
四 运作结果	160
第三节 高地写作：甘孜藏人的价值输出	161
一 本土书写：意西泽仁、桑丹	162
二 高地写作：格绒追美、达真	165
三 非高地写作者的高地自信：列美平措、尹向东	183
第五章 藏羌作家文学的阿坝模式	191
第一节 藏羌混声	192
一 藏人新诗	192
二 《新草地》	194
三 羌族文学	198
第二节 多路径传播	205
一 阿来的个体传播	205
二 阿坝作家群的整体传播	208
三 灾后羌族文学的整体传播	219
第三节 世界与民族：藏羌作家的差异	227
一 藏地阿来：边地即世界	228

二 羌族书写：叶星光与谷运龙	237
三 羌族羊子：坚定地“说”	245
第六章 四川省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特点	253
第一节 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则发展方向不同	253
第二节 四川省多民族作家文学发展与政治关系密切	254
一 文学作为国家事业	255
二 疏离与反控制	257
第三节 四川多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区域关系很大	259
结语	263
一 多民族意识形态	263
二 多民族文学关系	269
三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271
附录	276
参考文献	281
后记	301

当代四川多民族作家文学研究

绪 论

当代四川多民族作家文学成果丰硕，以汉语创作为主，以汉、彝、藏、羌四个民族作家为主。

四个民族作家发展模式不尽相同。汉族，分布在四川全境，主要活动于川西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其发展步伐与国内汉语文学基本同步。彝族，主要分布于凉山州，其发展依托汉语文学，以诗歌写作为主，目前的传播途径主要为官方、学院、民间三种。藏族，主要活动于甘孜阿坝两州，其发展分甘孜、阿坝两种模式。甘孜的藏族以汉语文学起步，依靠康巴作家群品牌推广进行作品推出。阿坝的藏族和羌族一起，早期创造了个体传播的奇迹，目前主要依靠官方和民族结群的方式进行作家培养和作品输出。

在审美理想及表现上，在民族身份及意识上，各民族作家又有所不同。

本书择取四个民族作家文学，进入其主要活动场所进行考察，发现其不同的发展模式，呈现其不同的审美样态。累积成书，希冀为四川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 本书研究：多民族

“多民族”，意味着多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多民族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新方向，也是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新阶段。

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自诞生之初，便与民族文学关系

密切。^① 中国文学人类学在近 30 年的研究中，逐渐成为民族文学研究重镇。1996 年，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成立。主要有五个研究方向：重释经典、原型批评、神话研究、文学与仪式、民歌与表述。其中，对边缘文化、少数族群文化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叶舒宪，致力于扭转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小传统”说；徐新建，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参与发起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参与讨论推广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他们对既有的中原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文学观与文学史观发出挑战，使人们注意到少数族群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自民国以来，“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短语被明确提出，则其与“汉族”呈二元对立状态，其中隐含着多少文化差异和区别对待的意思！——中原人向来视非中原文化圈的人为蛮夷。^② 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点，并由此确立其研究目标（之一）：打破文学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实现多元平等。21 世纪之初，文学人类学学者参与到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之中，帮助确立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多民族。^③

“多民族”一词的确立，并非空穴来风，其出现受到国家民族政策、文化思潮和文学研究进程的多重影响。国家政策方面，1954 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982 年，中国第四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

^① 文学人类学起源于西方人类学中的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中的总体文学研究。前者如泰勒、弗雷泽和列维·斯特劳斯，后者如梵·第根和韦勒克。形成两条研究路径：文学的人类性研究和人类的文学性研究。波亚托斯和伊瑟尔二人分别在两条路径上掘进，弗莱则试图集二者之大成。不管是做文学的族群性研究还是人类的文学性研究，文学人类学都要以民族文学（族群文学）为研究对象。叶舒宪认为，文学研究经历了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再到文学人类学这三段变革，也就是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再回到民族文学。这折射出现代世界史和思想史上相继发生的两次否定之否定进程——从地方化到全球化，再从全球化到地方化。这与其说是简单的循环式复归现象，毋宁说是螺旋式的递进发展。参见叶舒宪《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文学观念的当代转型略说》，《当代外语研究》2010 年第 7 期。

^② 《礼记·王制》中便有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描述，并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观点。

^③ 最早提出“多民族文学”概念的是邓敏文。参见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2004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关纪新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徐新建共同发起，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随后，“多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史观”逐步得到学界认可。